


规划时空维度丛书 | 主编 王金岩 

城乡规划时空笔记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PACE-TIME NOTES

王金岩 等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规划时空维度丛书/王金岩 主编

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项目(BS2012SF019)

城乡规划时空笔记

王金岩 等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5

内容提要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体形态,代表着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觉醒和对世界秩序的描述及重建。城乡规划则是基于人类聚居的自然与人文规律,通过对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协调来引导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以实现趋利避害和成就宜居梦想的工作。本书将城乡规划理论与实践置于宽阔的人文视野之中,通过城市的文化观相、中国古代人居世界、现代性与城市、规划与美好世界四个板块的开放式评论,探讨了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文化渊源,也展示了城乡规划在改变人类生活聚居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书可供城乡规划、人文地理、建筑设计、城市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师生及相关专业人员参考,也可供对城市、乡村和城乡规划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乡规划时空笔记 / 王金岩等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6

(规划时空维度丛书/王金岩主编)

ISBN 978-7-5641-5805-7

I. ①城… II. ①王… III. ①城乡规划—中国—文集 IV. ①TU98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0047 号

书 名: 城乡规划时空笔记

著 者: 王金岩 等

责任编辑: 徐步政 孙惠玉

编辑邮箱: 894456253@qq.com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 江建中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新翰博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332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5805-7

定 价: 39.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总序

寂静的森林、辽阔的原野、碧绿的河水、奔腾的野兽，以及习习的微风，这是原初人类栖息地的场景。《周易·系辞·上》中云：“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终于，人类在审视世界动静变化和吉凶悔吝的劳绩之中，跨越了草莽蒙昧，自然与人文精神交相辉映，建构了多元的时空秩序，进而使聚落、乡村、城市、区域及巨型区域的人类聚居文明繁衍拓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众生世界。

关于众生世界，佛教《楞严经》中云：“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一切众生织妄相成，身中贸迁，世界相涉。”在东方农耕世界，世以年计，界为田分，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天地人间皆统于“道”。众生在“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认知之中，寻求“穷理尽性”，以达“天人之际”的路径。

西方世界早期将世界理解为“土火水气”，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人文界定世界的精神渐渐生发。中世纪有神论和救赎理念深入人心，众生期待人神和解，而重返伊甸。及至中世纪末期新教伦理的抗争，发现“奢侈”和思想解放与对上帝的信仰并不矛盾，更未导致上帝的惩罚，至文艺复兴后理性和自由理念一发不可收拾。神学的世界观也被科学的世界观彻底刷新，培根和笛卡尔创始的现代梦想，将“众生”带入了另一个境界。人类“祛魅”的自由勇气推倒了一切堡垒，外达太空火星，中至城市区域，微接上帝粒子，塑造了全新的众生世界。

其实，无论东方、西方抑或其他地域，众生世界都没有逃脱一个基本问题——人与时空，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类会在特定的时空认知中回答“关系”的意义，虽然答案各异。在涂尔干那里，时空被解读为“社会的构造物”，并通过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衔接，形成可沟通的观念。若放大“观念”的共性，世界一切学问，大至宇宙，微至无间，不管采用科学、哲学，还是宗教的办法，都是在寻求可以接受和沟通的“真理”，并在种种人生和社会的危机挑战面前，找到智慧的生存“化解”之道。这自然引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求真，即是什么，为什么？其二，化解，即怎么想，怎么办？

围绕这两个问题，我们认为在地球地表空间、区域城市空间、建筑景观空间等一系列视觉直接可及的“中观”尺度上，人类求真与化解的能动性行为最为异彩纷呈。这些行为时刻影响着社会权利的分配和个人梦想的实现。人类也是在这一尺度上通过多元的规划手段，构筑了五彩斑斓的人类聚居文明。这更是当代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等人居环境学科存在的价值根源。

有鉴于此，本丛书定名为“规划时空维度丛书”。我们期待以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等人居环境和城市学科为立足点，形成开放式的交流平台，围绕着人类聚居空间形态演变的基本规律和特征，以及规划调控在引导人类聚居空间发展方面的作用这两个核心问题，打破学科藩篱，鼓励另辟蹊径，激发学术探讨，汇聚直达内心的清泉，为更好地揭示人类聚居发展进程中的时空现象，引导人居环境建设中的规划范式选择服务。这是我们

从学科和职业的角度反思发展处境,照亮前行道路所需要的。本丛书希望成为学者、学生和广大专业从业人员的参考资料,也希望成为一般读者的普及性读物。我们要诚挚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一如既往的理解和支持!在一个功利和躁动的时代,各种支持探索的真心诚意都值得倍加珍惜。所以,我们欢迎学界同仁的指导,更感谢并勇于接受一切批评!

王金岩

2014年仲夏

前言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体形态,代表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醒觉和对世界秩序的描述及重建。与城市、乡村物质景观的构筑相对应,人类也同时创造着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的非物质秩序。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传统和人类对新秩序的憧憬“相摩相荡”,一并催生了多元的地域文化和灿烂的人类聚居文明。

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从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漫长征程。静静生长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在血和火的苦难历程中被唤醒。新的城市和乡村聚居形态不断涌现,并衍生了新的聚居和建筑文化。绵延时空的城市化过程,与聚居环境的激烈变迁一起,前所未有地影响并刷新着人们的生活。规划,城乡规划,或者早前所称的“城市规划”,成为变迁时代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街头巷尾的热词。普通的城乡居民发现,城乡规划帮助自己在城市或乡村里获得了更加舒适和体面的生活,并协助自己成就了梦想。但是,也有人发现,不恰当的“规划”,使自己为生活投入了更多的成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围绕“城乡规划”有两个核心命题值得关注。第一,城市或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物质的时空特征究竟为何?“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系辞·上》)亦即如何对聚居环境的时空特性和文化传统进行合理的解释。第二,如何对城市或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物质的空间秩序进行重建?亦即如何对聚居环境进行规划并指导建设,以实现新的需求和梦想。从业的规划师或建筑师,均知晓现代城乡规划经历的从纯粹艺术到工程技术,从工程技术到公共政策,从公共政策到治理过程的转变。很多人认为这是规划的本质性“回归”。其实,《吕氏春秋》中云:“故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也就是说,规划师的工作应该是基于自然与人文之“法”,对物质与非物质环境进行高超动态应对。这种“应对”应依据时空价值特征辩证选择,以达趋利避害、成就梦想的目的。其间的各类艺术、工程、政策和治理措施,可以理解为“术”。“法”“术”结合,方为规划之本真。

沿循这种思路,紧扣城乡规划“是什么?”“怎么办?”的核心命题,笔者以若干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分门别类整合成专题性框架,并加以评注,形成本书。在当代,中国城乡规划理论秩序的重建需要三个重要支撑,分别是世界成功经验、当下本土实践和古代文化传统,这是历史与辩证逻辑的统一使然。在本书的内容中,这三大来源皆有所涉。本书的内容框架为:第一篇“城市的文化观相”,总述城市形态的文化特征,并对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理性范式进行了探讨。第二篇“中国古代人居世界”,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泛生命”人居范式。第三篇“现代性与城市”,论述了现代性价值范式之下的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第四篇“规划与美好世界”,从论述规划的本质和规划师的职业特征入手,论述了规划需要兴时而动、反思时空价值,以引导城市和乡村空间发展之优化。

该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得到了“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项目(BS2012SF019)”的资助。第一至第四篇的“导论”部分以及各章节的修订、调整及专栏由王金岩完成。诸篇导论部分立足于跳出城乡看城乡、跳出规划看规划,以多维的视野探赜

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时空画卷,索隐城市和乡村中蕴含的文化渊源。导论之外,主要研究者的担当章节为:王金岩、梁江、孙晖(第1、2、3、4章);王金岩、梁江(第9章);王金岩、吴殿廷、袁俊(第10章);王金岩、吴殿廷(第11、14章);王金岩、韩露瑶(第12章);王金岩、何淑华(第15章);王金岩(第5、6、7、8、13章)。

其中,第1—4章内容是孙晖、梁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市场经济下中心城市形态演化模式及动因机制分析(批准号:50108002)”的相关基础研究。关于该部分内容的理论渊源和更加系统的论证,可参见梁江、孙晖所著的《模式与动因——中国城市中心区的形态演变》一书。第10章案例应用的相关理论模型可参见吴殿廷所著的《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一书。第15章内容案例源自何淑华主持的课题“德州市临邑县村镇体系规划(2009—2030)”。林忠军对第8章内容进行了指导,并提出了修改建议。第6章部分内容也收入了王金岩所著的《空间规划体系论——模式解析与框架重构》一书中。

全书由王金岩统稿。研究生王梓诺、韩露瑶进行了基础资料的整理,并绘制了相关图片。

本书要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的梁江教授、孙晖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殿廷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的林忠军教授多年来对笔者的支持,他们的影响使得本书致力于进行较为宽阔的开放式探讨。本书要特别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徐步政老师、孙惠玉编辑!他们一如既往的理解和帮助,极大鼓舞了本书的整理和写作。本书还要感谢《城市规划》、《规划师》、《城市发展研究》、《城市问题》、《现代城市研究》、《华中建筑》、《商业研究》等杂志对本书各篇章在“论文”阶段的信任和支持。

城乡规划本身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复杂综合性命题,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技术、哲学等方方面面。限于我们在能力、水平、资料和时间方面的限制,我们恳请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对本书所涉内容多多宽容和谅解,更希望广大读者多提批评意见!同时,我们也力求将专业观点进行通俗和趣味表达,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

王金岩

2014年于山东大学

目录

第一篇 城市的文化观相

导论 A:心灵	001
1) 关于心灵	001
2) 心灵模式	003
3) 文化假晶	004
4) 城市观相	006
1 街廓是城市的细胞	010
1.1 街廓与细胞	010
1.2 街廓含义之辨	012
1.3 关于街廓的研究	016
2 街廓模式文化观相	022
2.1 古代传统街廓	022
2.2 西型东嵌街廓	027
2.3 计划单位街廓	032
2.4 市场映射街廓	035
3 街廓的时空变迁	043
3.1 街廓时空演变	043
3.2 街廓演变动因	049
4 街廓理性范式探索	053
4.1 街廓尺度定性分析	053
4.2 街廓尺度定量分析	061
4.3 街廓结构定性分析	070
4.4 街廓结构定量分析	075
4.5 街道宽度定性分析	078
4.6 街道宽度定量分析	080
5 都市缝隙中的街廓	085
5.1 揭开城中村的面纱	085
5.2 城中村的特征与困境	087
5.3 城中村的成因分析	089
5.4 城中村的改造讨论	091

第二篇 中国古代人居世界

导论 B:幻方	094
1) 始诸饮食	094
2) 九宫幻方	095
3) 天地数理	098
4) 演绎世界	101
6 生命理性与古代城市	105
6.1 从易到礼	105
6.2 隐性框架特征	106
6.3 泛生命的哲学	109
7 道与超现代规划范式	111
7.1 城市与格式塔	111
7.2 从现代到超现代	112
7.3 超现代城市规划	113
7.4 超现代再中国化	116
8 从《汉志》看古代规划范式	118
8.1 《汉志》与规划	118
8.2 《汉志》中的规划取向	120
8.3 从《汉志》看《周礼》《管子》中的规划思想	122
9 明代兖州与藩王城规划	124
9.1 明代兖州城的营建	124
9.2 明代兖州城的布局	126
9.3 选址与尺度问题分析	127

第三篇 现代性与城市

导论 C:隐喻	133
1) 曼哈顿	133
2) 自由之光	135
3) 复活节岛	137
4) 摩登时代	139
10 区域发展的时空差异	143
10.1 灯光下的区域差异	143
10.2 区域发展差异较普遍	144

10.3	区域发展差异的特点	144
10.4	解释区域发展差异	146
10.5	从发展差异看发展战略	149
11	城市空间的辩证乌托邦	154
11.1	哈维与乌托邦	154
11.2	全球化与空间不平衡	155
11.3	中国城市乌托邦	158
11.4	辩证城市空间的重构	160
12	城市综合体的时空解析	163
12.1	综合体与城市时空重组	163
12.2	综合体的规划设计是个综合题	169

第四篇 规划与美好世界

导论 D: 色谱		171
1)	规划是什么?	171
2)	规划色谱	172
3)	规划师与巫	179
13	城乡规划法在中国的演进	183
13.1	诸版规划法流变	183
13.2	2008 版《城乡规划法》的价值拓新	184
13.3	从《城乡规划法》看空间规划体系	188
14	健康城镇化与规划辩证调控	191
14.1	城镇化与人地关系	191
14.2	规划的应对性保护机制	193
14.3	规划的全局整合	195
15	乡村规划的树形与互动网络	198
15.1	TOD 与村镇社区	198
15.2	TOD 村镇社区案例分析	200
15.3	TOD 村镇社区价值拓延	203
参考文献		207
图片来源		215
表格来源		220

第一篇 城市的文化观相

导论 A: 心灵

迄今为止,也只有人类才能在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创造文化,营建城市,繁衍文明。若从不同的地域来审视人类文化,五洲四海的城市文化皆是那么的绚丽繁多。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杰作。在展开本篇正文之前,让我们谈谈“心灵”“文化”与“观相”问题。这三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自内而外地审视城市、欣赏城市。

1) 关于心灵

据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立于公元 698 年)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有一个法号叫乐傅的僧人游历于敦煌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他在落日余晖中远眺,看见崖山呈现万丈金光,似万千佛像闪闪发光。他认为这是佛谕,于是满怀虔诚,在崖壁上架梯凿岩,开辟洞窟,这便是莫高窟的创始。佛像多为石胎泥塑,即先在砂砾岩壁上凿出大体轮廓,然后覆泥,再做细致塑造,最后上彩。莫高窟经过信仰者千余年的开凿塑造,成为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樊锦诗,2009)。

笔者曾经去莫高窟游览。比肩接踵的人群,好像淹没了佛门的清净。但是走入石窟,佛像惊人的尺度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依然会直达内心。在众佛塑中,最高的一尊佛像为 35 m 高的弥勒佛像。该佛像面形丰圆、活灵活现,微微俯视的双目似乎与参拜者交流对话(图 A-1)。立足佛像脚下,顿感精神世界的震撼和凡间人体尺度的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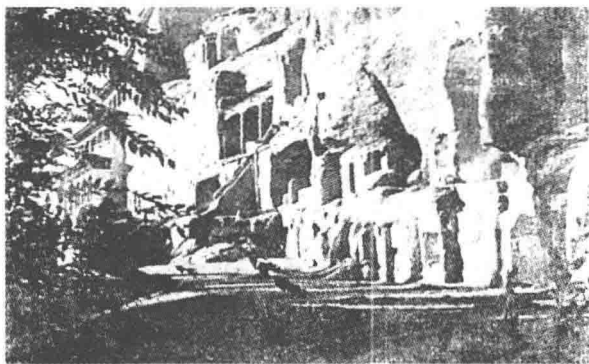


图 A-1 莫高窟 20 世纪中叶景观与 96 窟大佛现状图

实际上,人类对于理想世界往往有一种神秘追溯和探索的冲动,并把这种探索物化为特定的形态,这可视作一种文化本能。这种本能造就了不同地域的万千造型艺术。笔者感叹于佛教造像艺术对人心灵的震撼。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熏陶下的心灵,会非常明确地解释乐傅的“虔诚”:崖山的万千佛光并非佛祖造化,闪烁佛光不过是砂砾的复杂散射、反

射、衍射现象。

在乐僂发心造窟的前一年(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了。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主之际,社会动荡。虽“心远地自偏”,但他怀有“大济苍生”之志,仍旧对社会有一个美好期待,于是以文言志。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浪漫的建筑师、规划师。《桃花源记》一文表达了他的理想空间: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好一幅动态鲜活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图景。但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就远没有乐僂的莫高窟这么幸运了。虽然太守和南阳刘子骥均想亲眼一见这个世外桃源,但因种种缘由终不得见,美好的图景在时空之中灰飞烟灭。当代建筑师和规划师在理想和现实间的心灵彷徨,与《桃花源记》所述境域难道不是如出一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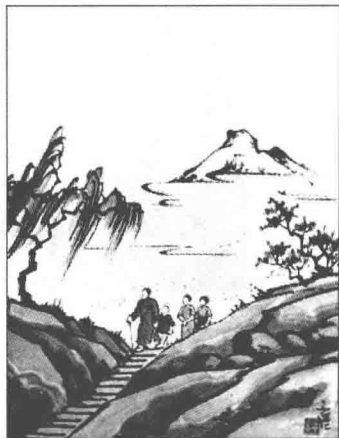
比乐僂和陶渊明早约800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在距离敦煌6000 km之外的希腊提出了著名的“洞喻”。这个富有哲理的寓言,可以很好地对乐僂和陶渊明的经历进行诠释:洞穴中,一群囚犯的手脚都被捆绑,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但身后燃烧篝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有一天,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挣脱枷锁,摸出洞口。他体验到了阳光下的鸟语花香和别样风景,遂返回洞穴以告他人真实的世界。但是其余的人实在是理解不了,并认为他们这个淘气的伙伴万分愚蠢。柏拉图的寓言说明“形式”中的理性世界是沐浴阳光的鸟语花香,而我们所能感受到和看到的不过是墙影,这也启示我们:佛像、桃源和墙影均不是世界的“本真”。诸种“幻境”,可称作“文化”世界。

早于柏拉图100多年,在敦煌以东2000 km的山东曲阜,曾有一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与孔子的对话。他们讨论了“理想”问题,曾皙不像他的三位师兄弟,或谈从政,或谈出使会盟,或谈施展抱负,他强调生活的当下,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有这种境界: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于是,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自魏晋以来,及至宋明理学时期,很多经学家认为孔子、曾皙为同道之见。曾皙描述了一个太平盛世的惬意,这种惬意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所云的从政治国、抵御外敌、发展生产再到推行教化并不矛盾,而是逐层递进、有机统一的“缘在”的过程。这与近世的现象学、过程哲学有着相似的境界。曾皙的意趣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对“形式”理性恒久世界的追逐不同,是展现了一种与当下的融合。

曾经有朋友问我:生活需不需要规划?按曾皙的观点,生活就如缓缓的流水,去体验即可,不需超越性的理性“规划”。正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偶成》),这是一种与“时”相合的生活规划态度。丰子恺先生的画作《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正是从绘画的角度描述了这种旨趣(图A-2)。



图A-2 丰子恺《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绘画

孰对孰错？这就是心灵的特定生命力吗？美国人文地理学伯克利学派代表人物索尔(Carl Sauer)认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和价值认同。从这个角度,我们审视一种文化景观或者社会意识,就要回归到那种景观所存在的复杂自然背景和社会存在之中去,融入方见其特性。有两个欧洲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试图将文化景观差异进行理论化的建构。

2) 心灵模式

1912年,在德国慕尼黑贫民窟的幽暗小屋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就着昏暗摇曳的灯光,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开始了他宏大的写作规划。烛光中诞生了一部在西方世界及东方世界都振聋发聩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它的作者就是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斯宾格勒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文史、数理和艺术对斯宾格勒的多维影响,使得他对人类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有着类似生命的结构:世界是一个生成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处在生长、构造和变化之中。这种有机的生成绝不是牛顿的机械力学,而是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情感和特性,并需经历生命与衰亡。这个观点明显受到了19世纪以降人类学发展的影响,隐秘地映射了当时人类学从“古典进化论”学派,向“文化传播”学派的转变。但是,“文化传播”学派对斯宾格勒的更大影响在于,其促使斯宾格勒摒弃了欧洲单一发展范式主导世界的“神话”,而确立了文化多元的理念。

我们似乎又洞见了柏拉图的魅影。经历了牛顿和笛卡尔的机械宇宙观,自康德后,德国哲学一直想解决柏拉图心目中的“现象”与“自体”的分离,亦即心灵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真实与现象的关系问题。而斯宾格勒与众多学者一样,意图将二者合而为一。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强调以文化的视角来透视整个历史发展,斯宾格勒把人类的一切活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建筑、城市、艺术等,全部纳入一个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并判断其生命阶段的特定“形态”。实际上,“形态”这个概念本来自于生物学,用以比较和分析生物现象和生物类别,以判定其形式、结构和生产特征。这种方法后来在地理、地质、建筑和城市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斯宾格勒对历史和文化的审视称作“系统”和“观相”的形态学。

“观相”在中国作为民俗被称作“相面术”。相面术中有句话叫做“相由心生”。该词本出自佛教经典《无常经》,佛曰:“世事无相,相由心生。”“相”的意义一般是指面相,也指整个相貌,相由心生即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面相。一个人的个性、心思与作为可以通过面部特征表现出来。在西方,“观相术”更不是新鲜玩意儿。作为一门跨越科学与艺术的特定学科,观相术旨在通过大自然事物的表象体察其内在的属性。亚里士多德在《观相术》(Physiognomoniká)一文中就介绍了以自然哲学的方式来体察事物本质的可能性。18世纪以后,观相术在医学、心理学和地理学中有了全面的应用,如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博物学家,19世纪科学界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发展了将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作为判定“一方水土”的观相术。虽然19世纪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文和自然地理的观相逐渐被精

密的设备、仪器所取代，并且观相术还在犯罪、人种等方面误入歧途，但是，其在西方作为一种直观的分析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斯宾格勒的“系统观相形态学”也是扎根于“观相术”全面复兴的时代，他将“艺术的形式跟战争与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之间，宗教概念和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和认识之间，都出现了深刻的关系”。按照他的系统观相形态学，人类历史存在着八种文化，它们是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

作为“新斯宾格勒学派”的一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类人类。”这不是传统史学的国别和断代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类似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类人，是相对有机的文明、社会概念，或称文明的模式，在这一尺度上，人类文明的浪花是金光闪闪、形态各异的。

汤因比的“文明的数量”，由斯宾格勒的八种扩大到三十多种，这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进行了广泛列举。在这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或者说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他也像斯宾格勒一样，承认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这类文明中的一个而已，同样摒弃了“西欧中心论”。在汤因比看来，以上这些文明尽管出现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对于文化发展特性超越时空的可比性，诸如新生的、发展的、没落的，斯宾格勒称作“同时代”。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认为，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能顺利成长。有些文明是短暂而绚烂的，有些文明是平静而绵长的，有些文明在生长的早期阶段就草草收场。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文明必须有自我生长的自决能力，勇于吸收文明的转移成果，这是文明恒久和富有创新力的关键所在。

20世纪出现了诗意的栖居者——海德格尔，他的存在论使得冰冷的机械理性主义遭到了极大的质疑，经由柏格森、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系统哲学，以及以普利高津为代表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激发了人类对生命和心灵的新认识。21世纪以来，东西文化的持续交流和激荡，“量子理论”与“道”的有机融合，使得人类在复杂系统学新框架的指引下对自然的理解逐渐从必然瞄准了全新的自由。

毫无疑问，文化世界的鲜活生命力是人类最大的遗产。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建筑、城市、艺术均浸于其中。在大地母亲面前，人类仿佛一群活泼的孩童，跳着、笑着、走着，正如汤因比（2001）所言：

“人类是大地母亲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国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3) 文化假晶

然而，不同的心灵是可以有互动的，甚至是弱肉强食，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形态。

在矿物学上,有一个词汇——假晶,指岩层中所掩埋的矿石结晶体,由于水流的冲刷其内部出现空洞,后来由于熔岩注入结晶体的空洞,然后再依次凝聚、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结晶体,被称为“假晶”。“假晶”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不断的推进,不同的文化吸收、融化、调和而形成全新的形态。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贴切地反映一个族群在适应外来文明压力下产生的文明变形状态。在他看来,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都是“文化假晶”现象之一。

以俄罗斯为例,从1703年圣彼得堡建造时起,俄罗斯文化中的“假晶现象”就开始出现,外来文明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先是巴洛克的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例如,圣彼得堡城市空间中分布着从18世纪到20世纪世界各种建筑风格,城市本身俨然一座露天博物馆。著名的建筑有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大教堂,以及要塞附近的彼得大帝小舍、海军部岛上的彼得大帝花园、华西里耶夫岛上的缅希科夫公爵府、涅瓦河畔的伏罗佐夫大臣府和斯特罗加诺夫大臣府等。这些18世纪建筑是典型的俄罗斯早期巴洛克风格。斯莫尔尼宫、冬宫、大理石宫为18世纪后期建筑。后来的喀山大教堂、高达101m的伊萨基耶大教堂则为19世纪建筑。另外,圣彼得堡郊外还有诸多风格各异的皇家离宫、别墅。

持续的文化假晶使得圣彼得堡既有巴洛克风格建筑,也有洛可可风格建筑,城市空间组织既讲究对称布局,又不拘泥于严格对称,既追求巴洛克轴线,又注重宜人尺度。假晶现象熔铸了圣彼得堡的城市空间形态。位于涅瓦河南岸的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1782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法尔科内作品)腾空而跃,其脚踩象征守旧的大蛇,扫除了城市空间假晶进程中的各种障碍,把落后贫穷的俄罗斯,带向了新的时空境界。

如果我们放大地理与历史的视野,追本溯源,不难发现:从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之间的地域范围之间,分布着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文明,以及中美洲文明(图A-3)。文明与原始有两点区别:一是定居的农耕生活和发达的灌溉系统,或者发达的商业交易,以及围绕农耕或商业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二是精神的共同体,以及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而文字也是判定史前状态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些农业或商业文明分布的地域范围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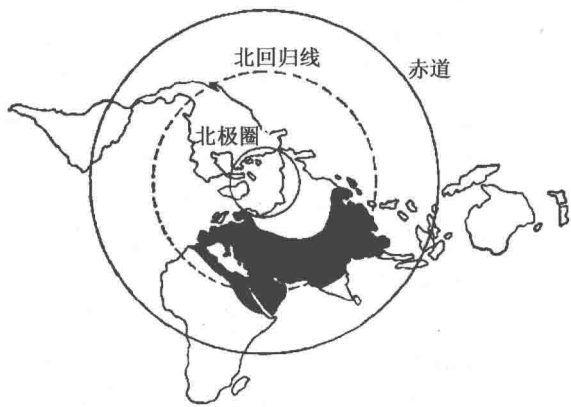


图 A-3 世界早期文明地理分布示意图

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因此,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地区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于是在亚欧大陆上,就形成了生活方式上南农北牧,经济状况上南富北贫,军事实力上南弱北强的对峙局面,这种对峙持续了近五千年。对峙激发了文明的演化和生生不息的嬗变,基于时间的嬗变和基于空间的扩散,使得文化与文明的融合一刻也没停息,文化假晶现象造就了人类的璀璨和辉煌。

从公元前20世纪一直到公元后15、16世纪,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的时空融合和文化假晶最终造就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和儒家文明。这些文明范式不依人种划分,而是体现了富有生命的人类精神伟力。如果说横亘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像一条“文化假晶”的河流,串联了不同的文化地域,那么在这条文化河流之中,乐僂及他的莫高窟则像一朵金光闪闪的浪花。

公元15、16世纪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时起,时间和空间层面围绕着游牧和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在大视野上暂时停歇。但是,一个新兴的脉动牵动了西方的神经,这就是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到来,它蔓延至全球,并摧毁了一切农耕范式下的万里长城。一个持续的文化假晶、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一直持续到后现代的今天,并将地球压缩成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地球村。在地球村统一的节奏之下,在对微观的城市和聚落中,也“假晶”出了各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形象。

4) 城市观相

上述对文化和文明现象的回顾是为我们引入对城市的探讨服务的。关于城市,先贤们的至理名言振聋发聩。莎士比亚说:“人民就是城市。”这句名言被广泛地引用。伊利尔·沙里宁(Elieel Saarinen)也有一句名言:“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这一句,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自问自答,“怎样才能称之为座城市?在完整的意义上,城市是一种地理学中的神经丛,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一种集合所有社会行为的大剧院,一个创造性集合的美学符号。”

芒福德把城市描述为人类生存的场所,生活的剧场,心灵的家園,文化的缩影,物质与非物质交叠的生命体,一种动态变迁的人类聚居形态。在他的眼中,城市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人类文化的沉积。文化和城市的相互作用在他的两部力作《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史》中都集中得到了体现。可以说,芒福德抽象了城市文化观相的核心价值,并把这种范式生命的价值付诸于城市历史与逻辑范式的建构之中。他把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概括为六个阶段:原始城市(Eopolis)、城邦(Polis)、中心城市(Metropolis)、巨型城市(Megalopolis)、专制城市(Tyannopolis)、死城(Nekropolis),并分别阐述了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意义、文化演变及特征:

第一阶段——原始城市(Eopolis)发端于农业村庄,并以之为原形;城市产生前有村庄,城市消亡后村庄的基因还在。

第二阶段——城邦(Polis)依托于村庄或血缘集团的聚集,分工导致了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带来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并催生了科学、艺术、卫生、数学和哲学。

第三阶段——中心城市(Metropolis)在差别不大的村庄或村镇群中,个别有特殊优势的地方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居民,发展成为中心城市,文化的精神力量更加具有引领作用,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对立也更加尖锐。

第四阶段——巨型城市(Megalopolis)是资本主义发展范式催生的新型文化形态,阳极阴生与衰退开始显现,权力和关系使得生活和道德通通捆绑了利益,“获利”的力量如此之大,掠夺和控制使得农业空间渐行渐远,城市的吞噬使得区域演变成了统一空间的巨型城市区域。

第五阶段——专制城市(Tyannopolis)是政治集团争夺资源的极端形式,掠夺和赤裸裸的剥削更加明显。道德全面沦丧,统治者和暴政的表演越来越变本加厉。

第六阶段——死城(Nekropolis),战争、饥荒和疾病破坏了城市和乡村,城市只剩躯壳,继而居民离散,废墟被沙土覆盖。

芒福德的归纳明显受到了他所在时代的影响,他认为六种“观相”形态发展类似于生命的过程,各有其特定的城市文化:

“城市的生命过程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高级生物体,城市可局部成长、部分死亡、自我更新……城市文化可以从遥远或长久的孕育中突然新生;它们可以借助于多种文化的三班倒来延续它们的物质组织;它们可以通过移植其他地区健康文化的组织而显现新的生命。”

这些观点芒福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我们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品出城市文化观相的味道。这里又要回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按照出生的时间,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19世纪的“80后”,而芒福德是“90后”。和两位兄长的“文化形态”相比,芒福德的六阶段论,体现了西方线性时空观的思想范式,折射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光影,更深受其“父辈”——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现代城市研究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先驱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与埃比尼泽·霍华德并称为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先驱)理论的影响。格迪斯将城市规划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运用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揭示城市在空间和时间发展中所存在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复杂关系。至芒福德的“城市观相”,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读出,城市已不再是冒烟的冰冷机器了,它有血有肉、复杂有机。

那么,人类有共同的城市文化吗?比什·桑亚尔(Bish Sanyal)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人类共有的城市文化DNA并不存在(张庭伟等,2013)。从21世纪的今天回望,很好地说明了斯宾格勒及至芒福德思想的闪光之处。城市的发展终究是螺旋演进的文化假晶过程,同时城市生命观相的范式是丰富多彩的,并且会活泼地交叠融合而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建立相对统一的评论尺度,但是并不能抹杀城市文化观相的五彩斑斓。

以西方建筑为例,最具文化假晶现象的建筑形式就是巴西利卡(Basilica)。在古雅典巴西利卡是对最高贵族执政官办公建筑的称呼,而不是一个建筑结构名称。作为建筑结构,希腊的巴西利卡也是罗马人引入的。罗马市里最老的巴西利卡是公元前185年老加图在罗马市场上建造的。加图的巴西利卡是一座立方体建筑,它有两个窄边,其中一个窄边朝罗马市场,是建筑物的正面,前面有一个平顶的门廊。另一个窄边是一个半圆,或者附带一个半圆形龛。及至基督教以前,这是一种西方人熟悉的形式。而早在基督教会出现之前,近东波斯的建筑形式是圆屋顶的清真寺。到了拜占庭时代,宗教会议为了调和东方和西方,在建筑形式中就将圆形屋顶引入了巴西利卡,并采用了“集中式”十字形平面新形态。兴建于532年的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大教堂成为这种宗教文化假晶的最典型代表,如图A-4所示。文化的DNA实现了交融和重塑。

再看中国城市的一个例子。济南老城里有一条“众神眷顾”的地方,一条不长的街巷里曾并列着城隍庙、将军庙、慈云观和天主堂四座庙堂,这条街巷也因庙而得名——将军庙街。将军庙街的空间形态在文化假晶的强烈进程中,各路神仙争相光顾,形成了奇特的城市文化“观相”。将军庙供奉的是驱蝗神刘猛,在农业发达的山东,自然有不少民众崇信。将军庙东侧是清同治年间兴建的济南城隍庙。如今,原址已经被民居挤占,只残存大